

口译过程的两阶段解读

——以一般语言理解和产出为参照

董燕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王斌华 香港理工大学

摘要: 本文结合口译研究人文学派和自然科学派的研究,提出口译过程的两阶段解读。该解读主要包括两个假设。一个是源语理解假设:源语理解以脱离语言外壳为主要途径,与一般语言理解的区别在于,源语理解伴随有译语的并行加工;并行加工通过递增加工而得以与脱离语言外壳加工融合。另一假设是译语产出假设:译语产出以意义驱动为主,与一般语言产出的区别在于,译语产出还可能被构式驱动。结论是:相对于口译过程的“三段论”假说,“两段论”的解读更为合理,因为“语言转换”贯穿在源语理解和译语产出过程中,“脱离语言外壳”是源语理解的主要途径,都不应视为独立的阶段。

关键词: 口译过程;源语理解;脱离语言外壳;并行加工;译语产出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73X (2013) 01-0019-06

导语:问题的提出

口译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发轫,迄今已有60余年的历史(仲伟合、王斌华,2010)。作为一门新兴的(子)学科,口译研究的理论建构比较薄弱,到目前为止,影响比较大的理论只有“释意理论”。关于这一理论,亦存在诸多争议(王斌华,2008)。争议的关键在于释意理论关于口译过程的假说(即“口译的三角模型”),焦点集中在其提出的口译过程的“脱离语言外壳”(deverbalization)阶段。但至今为止,脱离语言外壳这个概念具体指什么仍然有争议(许明,2010),脱离语言外壳与源语理解及译语产出到底是什么关系也不清楚,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目前的文献并没有解释清楚口译过程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口译过程中的源语理解和译语产出与一般的语言理解和产出有什么本质区别?

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口译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与一般的语言理解和产出有什么本质区别?研究思路如下:1)在人文研究派和自然科学派之间搭建桥梁,厘清其中可能存在混淆的关键概念,从而将不同学科关

于口译过程的关键概念落到实处。2)以一般的语言加工为口译过程理论建构的参照系,分析口译过程中具体发生了什么,突出口译过程的特色,避免在共性的地方反复纠缠。3)将人文研究派所擅长的宏观分析与自然科学派所擅长的实证探微结合起来,以实证探微的精细去充实宏观分析所涉及的每个过程。

1. 关键概念:源语理解、脱离语言外壳、并行加工^①

1.1 人文派的研究:源语理解与脱离语言外壳

倾向于人文研究的学者如 Seleskovitch 和 Lederer 等人(如: Lederer, 1978/2002; Seleskovitch, 1976)赞成口译过程的“三阶段论”,即口译过程包括三个阶段:源语理解、脱离语言外壳、译语产出,并认为源语转换成译语有两条途径:脱离语言外壳的方式(deverbalization)与语码转换方式(transcoding)。也有人(如 Isham, 1994)用另外一对词语来表达这两种方式的不同:基于意义的方式(meaning-based)和基于形式的方式(form-based)。

Machine Interpretation Research[A]. *Proceedings of Oriental COCOSDA-2003*[C]. 2003: 217-224.

[9] Setton R. *A cognitive-pragmatic analysis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9.

[10] Setton R.. Deconstructing SI: a contribution to the debate on component processes [J].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No. 11, 2002: 1-26.

[11] Tohyama, H. and Matsubara, S. Constru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Bilingual Speech Corpus for Simultaneous Machine Interpretation Research[A]. *Proceedings of 9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Speech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Eurospeech-2005)* [C]. 2005: 1585-1588.

[12] Tohyama, H., Matsubara, S.. Collection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Patterns by Using Bilingual Spoken Monologue

Corpus[A]. *LREC2006* [C]. Italy, 2006.

[13] Tohyama, H., S. Matsubara, K. Ryu, N. Kawaguchi, and Y. Inagaki. CIAIR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Corpus[A]. *Proceedings of Oriental COCOSDA-2004*[C]. Vol. II, 2004: 72-77.

[14] 许明. 口译认知研究的心理学基础 [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7 (6): 69-73.

[15] 许明. 跨学科视野下的口译能力研究 [A]. *全球化时代的口译——第八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80-91.

[作者简介] 许明,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口笔译认知过程、认知语文学和语篇理解。

[作者电子信箱] xuming.china@gmail.com

释意派学者 Lederer (2001) 认为, 译员“要捕捉并记住话语篇章的所有细微的意义差别和情感效果。……强调他们理解和重现的不是词语……篇章意义远远超过句子的意群和词汇涵义。”“即席口译员之所以能够记住意义的各种细微差别, 并自如完整地将其用 L1 表达出来, 是因为他启用了一项基本能力, 即在词语消失时记住理解了的内容。他摆脱了原语言形式。”因此, 她认为这种脱离语言外壳的加工方式是更加适合口译的方式, 对于提高口译产品质量有重要的意义。但是, Seleskovitch 和 Lederer 并没有解释清楚以下两个关键问题: 源语理解和脱离语言外壳具体是什么关系? 口译中的源语理解和一般的语言理解有什么区别?

Ladmiral (2005, 转引许明, 2010) 将翻译过程比喻为“三个分割点所确立的两个连续的矢量线段”。这三个分割点分别为话语录入的开始、脱离语言外壳的意义和译语产出的结束; 两条矢量线段分别表示源语的理解及译语的产出; 口译活动涉及脱离语言外壳的过程, 这是话语信息从话语语言层面到心理认知层面的过渡, 但不是一个“独立”的中间阶段。由此可见, Ladmiral 赞成口译的两阶段论: 源语理解和译语产出, 但其同样未厘清源语理解和脱离语言外壳过程的具体关系。

综上所述, 人文学派存在这样两个选择: 1) 维持口译三阶段论, 脱离语言外壳是源语理解过后的意义存在状态; 2) 赞成口译两阶段论, 脱离语言外壳是源语理解过程中的高级加工阶段。但是, 这两种观点都没有说明或者没有说清楚, 口译中的源语理解和一般语言理解有什么本质区别。也许有人认为是, 口译源语理解有更深度的加工。的确, 理解任务不同, 理解的加工深度可能不同。但是, 这不是源语理解和一般语言理解的本质区别。我们可以比较理解后口译和理解后复述两种情况下的理解深度, 前者的理解深度不一定就高于后者。

1.2 自然科学派的研究: 源语理解与并行加工

侧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心理语言学家把口译语言转换的在线过程作为研究对象, 提出语言转换方式为: 串行观 (serial view) 与并行观 (parallel view)。Macizo & Bajo 认为, 在并行加工中, “译语的词汇单位 (lexical units) 在源语意义组块 (meaningful chunks) 被完全理解并整合成语篇表征之前就以一种持续并行的方式被激活、被检测。”(2006: 2) 而在串行加工中, “在用译语产出所构建的意义之前需要完全理解源语输入” (Seleskovitch, 1976)。到目前为止, 文献中只有少数几个直接验证串行-并行的实验研究 (Macizo & Bajo, 2004; 2006; Ruiz et al., 2008), 实验结果都支持口译语言转换的并行加工^②。也就是说, 严格的心理语言学实验证明: 即使是专业译员, 也都采用了并行加工的方式, 都存在语码转换。图 1 显示两种加工的区别。从图中可以看出, 串行加工总是存在的, 否则不可能存在完整的源语理解; 因此, 争论的焦点在于, 是否存在横向的并行加工?

心理语言学常常采用“自定步速阅读”实验来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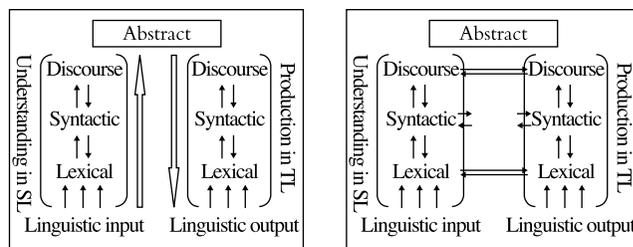


图 1 口译语言转换中串行及并行加工

(Macizo & Bajo, 2004) (SL: 源语, TL: 译语)

拟口译听力输入。实验要求被试在电脑屏幕上自定步速阅读设计好的句子, 每按一下键盘就出现一个词, 同时前面的词汇消失, 以此模拟听力输入的瞬时性。比如, Macizo & Bajo (2006) 比较复述任务条件下的自定步速阅读和口译任务条件下的自定步速阅读。其中一组被试要求阅读之后复述句子内容 (读后复述条件), 一组要求阅读之后口译句子内容 (读后口译条件)。实验观察在两种条件下的阅读中, 哪种条件下的阅读需要更多的工作记忆? 西班牙语-英语同源词 (cognate) 是否促进了阅读速度 (即同源词效应)? Macizo & Bajo 认为, 如果语言转换和源语理解是串行的, 那么两个条件下的阅读应该没有区别, 即在工作记忆的消耗上和在阅读速度上没有区别; 如果是并行的, 那么在读后口译条件下进行源语理解时, 译语就会被激活, 就可以观察到同源词效应; 同时译语的激活也会消耗更多的工作记忆。实验发现: 读后口译条件下消耗更多的工作记忆; 读后口译条件下的阅读时间长于读后复述条件下的阅读时间; 只在读后口译条件下观察到了同源词效应。Macizo & Bajo 认为, 实验结果支持并行观。

心理语言学的实验数据说明, 口译源语理解伴随有目标语激活 (即并行加工), 不同于一般的语言理解; 这些学者没有质疑口译的三阶段论或者两阶段论。

1.3 跨学科借鉴: 关键概念的厘清

我们认为, 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 释意派的脱离语言外壳与语码转换所指涉的研究问题不同于心理语言学中串行与并行加工所研究的问题。前者主要分析口译表现以及译语最终产品, 所以他们认为, 脱离语言外壳是实现高质量译文的主要和适宜的语言转换方式 (Lederer, 2003); 语码转换的方式则多体现在非专业译员身上 (Seleskovitch, 1976), 或者发生在口译暂时进行不下去的时候 (Paradis, 1994), 或者出现在书面形式的文本翻译中 (Seleskovitch, 1976)。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解释释意派的思路: 语码转换是作为高质量口译需要回避的方式而被提出来的, 其相反的方式就是脱离语言外壳。

心理语言学家在串行与并行加工的研究中强调语言转换的时间进程, 即语言转换是发生在源语理解完成之后还是和源语理解同时进行, 实际测量的是: 译语的词汇或者结构特征是否在源语的理解阶段得到激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说明实验被试在源语和译语之间进行词汇或者结构层面的匹配, 这就是并行加工 (Macizo & Bajo, 2004; 2006; Ruiz et al., 2008)。

由此可见,这两对概念虽然有相通的地方,但因为一个强调口译产品而另外一个研究口译在线加工,所以它们的含义不同。脱离语言外壳并不能否定并行加工的存在,并行加工并不一定是语码转换,因为并行加工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自动加工过程,和最后的译语产出是否摆脱了源语外壳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

2. 源语理解:脱离语言外壳+并行加工

释意派围绕口译产品质量这个核心问题进行研究,对口译训练有指导作用。但要科学地描述口译过程,释意派理论需要心理语言学的在线研究才能将一些关键概念明确下来,或者说,我们只有将人文研究派与自然科学派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将口译过程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根据现有文献,本文首次提出关于源语理解等于脱离语言外壳加上并行加工的假设,下面分三个步骤论证。其中,第一个步骤已经得到心理语言学在线研究的支持,后面两个步骤尚未见诸文献:

- 1) 源语理解伴随有一定的译语并行加工,译语并行加工不影响源语理解;
- 2) 译语并行加工通过递增加工方式融入源语理解之中;
- 3) 源语理解=脱离语言外壳+并行加工。

2.1 源语理解伴随有一定的译语并行加工

心理语言学的在线实验说明,口译源语理解伴随有一定的译语并行加工。前面我们介绍了 Macizo & Bajo (2006) 的研究。该研究发现,与读后复述任务相比,在西班牙语-英语口译任务下的阅读中,工作记忆消耗更多,同源词促进了阅读速度(同源词效应),说明并行加工的存在。Macizo & Bajo (2004) 采用同样的研究范式和同样的西班牙语-英语专业译员被试,观察句子阅读时间和利用语用知识的情况,发现:1) 读后口译条件下的阅读时间更长;2) 只有当 L1 是输入语言时,语用知识才促进了在线的理解,实验结果支持并行观。本文认为,第二个实验结果还说明,即使对于专业译员而言,L1 理解比 L2 理解进行了更多概念整合和意义推理,或者脱离语言外壳更加彻底。Ruiz 等 (2008) 采用同样的范式和被试研究源语理解过程是否受到译语语言项目特征的影响。两种语言有如下区别:西班牙语的形容词可在名词前或者后,句子的主语可有可无;英语中形容词一定要在名词前,句子必须有主语。当被试阅读的西班牙语句子在这两个方面和译语一致时,口译条件下的阅读时间显著缩短于读后复述条件下的阅读时间,因此作者认为在阅读西班牙语时,译员在匹配译语结构,一致的译语结构得到一定的激活,并促进了源语的理解速度。同时,Ruiz 等发现译语频率高的词在源语理解过程中速度更快。也就是说,三个实验从工作记忆、同源词、阅读时间、语用知识、译语词汇特征、句法特征等角度,说明了源语理解不同于一般的语言理解,源语理解伴随有译语的并行加工。这些作者没有区分同传和连传,但从实验操作上看,实验结果主要指连传。

本文认为,译语并行加工不影响脱离语言外壳的意

义整合。理由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根据 Green (1986),双语者在语言加工中,有一种语言是被选择的,一种是被激活的。也就是说,口译源语理解中,译语词汇或者结构被激活不等于被选择,只要没有被选择,就不存在语码转换,而这里的激活或者选择一般都是自动无意识的心理加工。第二,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心理语言学在线研究所探索的源语理解过程中译语词汇或者结构的激活与词汇歧义加工过程类似,比如 Elston-Güttler & Friederici (2005) 和 Love, Maas & Swinney (2003) 发现,高水平的 L2 习得者能够在句子语境中自动加工歧义词的两个词义,并能够及时排除和语境不一致的那个词义,完成句子意义的整合。也就是说,口译的源语理解过程中,相关意义(包括译语对应词)的自动激活并不影响源语意义的整合。

2.2 译语并行加工通过递增加工方式融入源语理解之中

译语并行加工如何与源语理解过程保持一致?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人明确。我们需要借助两个概念。一个是双语心理词库(mental lexicon)的非对称模型(见图2)。根据该模型,对于一般的非平衡双语者而言,在词汇层,L2 到 L1 的联系强度大于相反方向的联系强度;在词汇与概念的连接中,L2 与概念的连接强度小于 L1 与概念的连接强度。也就是说,对于非平衡双语者来说,L2 的词汇更加容易激活 L1 的词汇(而不是概念表征),而 L1 的词汇更加容易激活概念表征(而不是 L2 词汇);L2 词汇通达概念时可能首先需要激活 L1 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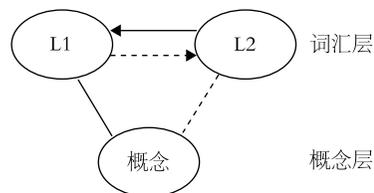


图2 心理词库非对称表征模型 (Kroll & Steward, 1994)

另外一个心理语言学的概念就是递增加工(incremental processing)。这是一个由 Kempen & Hoenkamp (1987) 提出并在言语产出研究的两大阵营(模块论和互动论)中被广泛应用的概念。比如,模块论的代表 Levelt (1989) 就是通过这个概念把互动论的观点吸纳进来,维护模块论言语产出理论体系,把言语产出的具体过程明细化。递增加工在言语产出中的意思是:每一段信息都是从概念生成到构成到发音这样分阶段地加工,各个阶段可以并行运作,但各个并行运作的阶段可能在处理不同的信息段。比如,发音阶段在加工句子的主语,构成阶段在加工主语之后的谓语,概念生成阶段在加工谓语之后其它成分。

本文将这一概念用于语言理解过程中:语言理解过程粗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1) 提取心理词库中的意义,2) 整合句内信息构建逻辑分句,3) 整合句外信息以便构建事件。三个阶段同时进行,但加工的信息段有输入

时间上的差异,比如当某一时刻 T1 的语言输入正在激活词库信息时,第二个阶段可能正在对时刻 T-1 的语言输入进行句内加工,第三阶段对时刻 T-2 的语言输入进行句外加工。笔者用图 3 表现某一时刻大脑中可能正在进行的递增加工(箭头向左表示:前面输入的文字在进行深度加工,后面的输入同时在进行浅表加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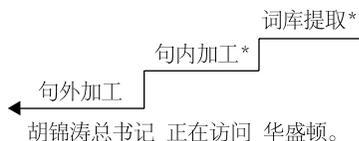


图 3 口译源语理解中某一时刻的递增加工
(*表示该阶段可能出现译语激活)

图 3 表示,在源语理解的前两个阶段都可能出现译语的并行加工。比如,在词汇提取阶段,几个相关的实验 (Macizo & Bajo, 2006; Ruiz, et al., 2008; Lin, 2010) 都说明,源语词汇理解受到了译语词汇特征的影响。既然这些实验操作主要是连续传译的模拟,因此结论针对连续传译;既然连续传译存在理解过程中的译语激活,那么同传也一定如此。图 3 中的词库因为是指心理词库,所以不仅包括个别的词,还包括固定搭配等两种语言匹配程度高的语言项目。输入的源语语言项目可能直接激活源语项目对应的词库概念,也可能先激活译语项目然后通过译语项目而激活对应的概念(见图 2),这些概念进入下一阶段的理解加工。由此可见,发生在源语理解第一阶段的译语词库的激活并不影响源语的理解,相反还可能促进源语理解,反映在缩短的时间上 (Macizo & Bajo, 2004)。

2.3 源语理解 = 脱离语言外壳 + 并行加工

源语理解和一般的语言理解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们认为仅有的少数文献并没有说清这个问题。脱离语言外壳既可以指加工 (deverbalizing),也可以指加工之后的表征 (deverbalized representation)。许明也作了这样的区分,并在精细推理之后选择了“加工之后的表征”这个定义 (2010: 10)。该文的推理过程是:如果要采用 Selescovitch & Lederer (1984) 的原始定义,那么就必须把“脱离语言外壳”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动态处理阶段,这一阶段的开始位置应该是按照‘主谓关系’和特定结构组织起来的‘逻辑分句’,即状态、事件、动作等高层次的语义单位……”(ibid:10)也就是说,“脱离语言外壳”指源语理解的高级阶段。按照这样的思路,口译就只包括源语理解和译语产出两个阶段。但是,两阶段论“不吻合口译实践”(ibid),因此只有放弃“动态处理阶段”,接受脱离语言外壳的意义表征解释。该文逻辑清晰,表述到位,但有两点尚未交代清楚:第一,既然把脱离语言外壳看成是动态的加工,该阶段的开始位置就不应该是“状态、事件、动作等高层次的语义单位”,因为这些意义单位已经是脱离语言外壳的意义表征了。

尽管这些意义单位还可以进一步组合成更加宏观的意义单位,但这只能说明,该文把脱离语言外壳的加工看成是“脱离了源语外壳之后的进一步加工”。这显然并不符合 Selescovitch & Lederer (1984) 的本意;第二,该文没有说明为什么口译的两阶段论与口译实践不吻合。

本文认为,脱离语言外壳应该指整个的语言理解过程,这个过程和一般的语言理解没有本质的区别。一般的语言理解就是一个脱离语言外壳的过程,也许正因为这是一个不存在争议的结论,因此脱离语言外壳不应作为一个专门阶段来看待。但是口译的源语理解和一般的语言理解有本质区别,这个区别在于,源语理解伴随有译语的并行加工,或者源语理解在词库提取和语内加工方面受到了译语的影响(见图 3)。译语并行加工和脱离语言外壳同时进行,因为脱离语言外壳是串行加工,而并行加工是和串行加工同时存在的(图 1);脱离语言外壳和串行加工名称不同,各自表达了其背后的研究方法和理念,但本质相同。

虽然脱离语言外壳就是一般的语言理解过程,即图 1 显示的心理语言学的串行加工,但本文最终选择脱离语言外壳这个概念来描述口译中的源语理解,原因有二:1) 串行加工在心理语言学的研究 (de Groot, 1997; Macizo & Bajo, 2004; 2006; Ruiz et al., 2008) 中被提出来的时候,是为了突出并行加工的存在,被等同于一般的语言理解加工,本身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研究;2) 脱离语言外壳突出了高质量口译产品所要求的源语理解的深度加工,彰显了口译过程研究的实践意义。

3. 译语产出: 意义驱动 + 构式驱动

很显然,一般的语言产出都是意义驱动的。在 Levelt (1989) 的言语产出模型中,意义加工 (conceptualization) 之后得到前言语语信 (preverbal message), 语信送入构成器 (formulator), 构成器激活心理词库使语信得到进一步的加工 (功能加工、位置加工及语音编码), 之后进入发音阶段。这三个阶段 (意义加工、形式加工、发音) 按照这个顺序自上而下进行,不可逆转,这就是模块论。所谓意义驱动,即意义先行: 语信限制了能够填入的词库内容。译语产出也应该是这样的过程,或者说以意义驱动为主。源语理解脱离语言外壳之后得到的是抽象的意义表征,若要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也需要经过意义加工,构成适合这种语言的语信,之后才进入构成器和发音器。

但是,译语产出也有不同于一般语言产出的地方,除了显而易见的表达内容来源上的区别之外,还有语言加工上的区别,但目前文献中并没有见到这方面的论证。这里分三步阐述:

第一,源语理解阶段译语的并行加工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部分译语对应的语言项目,包括词汇和结构,因此译语产出所选择的词汇及结构往往是那些与源语对应较好的词汇和结构。证据来自于跨语言结构启动 (cross-

language structural priming) 方面的研究。比如, 在 Hartsuiker, Pickering & Veltkamp (2004) 的研究中, 双语者听一些用西班牙语描述图片的句子, 然后用英语描述另外的图片。结果发现, 双语者倾向使用前面听到的句子结构 (在该文中指主动或者被动, 其它研究还包括双宾或者介宾等), 即存在跨语言的结构启动。跨语言结构启动之所以存在, 一般被认为是两种语言共享这些结构的结果 (见 Hartsuiker, et al., 2004)。总之, 在用另外一种语言进行表达时, 双语者倾向于使用前面听到的结构, 这种倾向是无意识的。另外, 如果要表达的结构中需要用到的核心词也是听到的该结构中的核心词, 那么这种倾向会明显增大 (Pickering & Ferreira, 2008), 这被称为词汇增强效应 (lexical boost)。由此可见, 源语理解激活译语项目或者译语产出使用源语对应项目都是自然而然的无意识的心理加工。

第二, 译语产出不仅倾向于使用源语理解阶段被激活的对应的词或者结构, 而且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构式所驱动 (construction-driven)。我们用“构式”这个词是因为构式强调其对应的结构意义, 是形式和意义的匹配 (Goldberg, 1995; 董燕萍、梁君英, 2002)。比如, 双宾是一种构式, 其形式是“主谓宾宾”, 意义是“X 使得 Y 接受 Z”。在源语理解阶段就被激活的译语构式, 因为本身就是形式 - 意义的统一体, 因此译语产出时就可能直接在言语产出的第二阶段即构成阶段得到词库的充实而进入发音阶段, 不需要从第一阶段即意义加工阶段开始。实际上, 这样的构式一定还与构式的核心词汇比如双宾的“给”动词一起被激活, 因此不仅具有语信的语义框架, 而且已经得到了核心词汇的充实, 只需要进一步的加工就可以进行语音编码。

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实译语产出有构式驱动的成分, 间接证据来自心理语言学关于位置加工 (positional processing) 的研究。位置加工是构成器中的第二个加工步骤, 即功能加工、位置加工、语音编码。Prat-Sala (2000) 发现在实验句中的客体为有生命性的条件下 (如 the bird), 相比客体为无生命性的条件 (如 the stone), 被试在回忆句子时更倾向于把有生命性的客体名词移到句首 (如 to the bird, it ran over the train; 即 The train ran over the bird)。也就是说, 因为有生命性名词比较容易激活 (即概念通达度高), 所以直接占领了更靠前的句法位置, 不需要通过前一阶段的功能加工而得到位置安排 (闫浩、董燕萍, 2011), 或者说功能加工受到了这些先激活的词的影响。依照类比推理, 在源语理解阶段就被激活的译语构式可能不需要通过前一阶段的意义加工, 直接得到词库充实之后就可以进行语音编码。

第三, 译语产出以意义驱动为主, 构式驱动为辅。受构式驱动的产出需要在恰当的时刻切入到受意义驱动的产出之中。如果这个时机把握得恰当, 那么译语产出将非常流畅; 相反, 可能影响译语产出的话语连贯性, 因为受构式驱动的产出毕竟只是一个小片段而已。把

握这个时间显然需要注意力资源, 而这个注意力资源可能不是简单的工作记忆广度问题。Köpke & Nespoulous (2006) 对比了同传专家、同传学生及两个控制组 (中年双语者和学生) 在各种工作记忆任务中的表现。结果发现, 同传专家和普通双语者的区别不在于一般的工作记忆容量或分配, 而在于与语义有关的需要中央执行器参与的任务上。如果译员控制不住这个时机, 结果很可能就是释意派所说的语码转换了。

总之, 和一般语言产出一样, 译语产出也是意义驱动的; 和一般语言产出不同的是, 译语产出还有可能受构式的驱动。为保证译语的连贯性, 构式驱动的产出需要在合适的时刻切入到意义驱动的话语之中; 这就需要工作记忆中央执行器的参与。

4. 结论：口译过程的“两阶段论”

经过推理分析, 我们再回到人文派的两个选择上: 1) 维持口译三阶段论, 脱离语言外壳是源语理解过后的意义存在状态; 2) 赞成口译两阶段论, 即脱离语言外壳是源语理解过程中的高级加工阶段。本文的观点是: “意义存在状态”不能算作一个独立的阶段; 如果把脱离语言外壳理解成加工阶段, 那么就应该指源语理解的整个过程, 不应该指脱离语言外壳之后的高级加工阶段。Ladmiral (转引自许明, 2010) 赞成口译的两阶段论, 但我们无法从 Ladmiral 的三个分割点所确立的两个连续矢量线段中看出源语理解和一般语言理解的区别, 而本文认为, 这个区别就在于, 源语理解伴随有并行加工。

不但脱离语言外壳不是一个独立的阶段, “语言转换”也不是一个独立的阶段。语言转换既可能发生在源语理解阶段, 也可能发生在译语产出阶段, 但主要发生在译语产出阶段, 很难论证这种加工如何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而存在。张群星 (Zhang, 2010) 研究了汉英口译学生在口译状语从句时语言转换情况。汉语中的状语从句或者状语一般在主句的前面; 而英语在这点上比较随意。当汉英口译学生阅读英语从句在后的句子时 (和汉语结构顺序相反), 口译条件下的阅读并不比复述条件下的阅读时间长, 但在译语 (汉语) 产出阶段, 译语在该结构上的产出却比汉语的复述时间长。这说明, 汉英口译学生在处理两种语言有区别的结构时, 在源语理解阶段没有激活译语的结构, 译语结构是在译语产出阶段才得到加工的, 也就是说, 语言转换发生在译语产出阶段。口译三阶段论虽然通过引入“语码转换”和“脱离语言外壳”这样的概念而推进了口译研究的深度, 但三阶段论并不能反映口译真实的过程。

本文的结论是: 口译过程包含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源语理解, 源语理解的主要方式是脱离语言外壳, 同时可能伴随有译语的部分激活; 第二个阶段是译语产出, 译语产出主要是意义驱动的, 同时也可能被构式所驱动。语言转换并非一个独立的阶段。

图 4 描绘了两个阶段构成的口译过程。为了确保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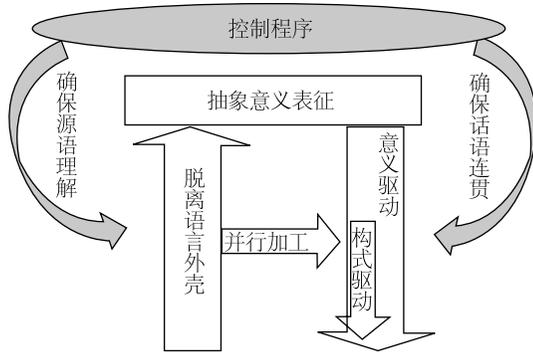


图4 口译过程两阶段模型

阶段的顺利进行,中央执行器中的控制程序对两个过程均有监控:确保源语理解的顺利进行,避免并行加工影响源语理解;确保意义驱动为主导,避免构式驱动影响话语的连贯性。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10BY010)“口译能力立体结构在口译训练中的优化过程”及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9JJD740007)“英汉双语控制的心理机制——以口译语言转换为例”的资助,并衷心感谢刘和平教授、许明博士、张群星博士的宝贵意见。

注 释

- ① 第一部分“关键概念”的主要观点初见于董燕萍发表在《中国英语教育》2011年第四期上“交替传译中的语言转换心理机制:非对称有限并行加工模型”。
- ② 董燕萍对此做了进一步的系列实验研究,发现目标语的特定语块能否被激活与两个因素有关(即‘从源语到目标语的联系强度’、‘译员的认知资源’),详见 Dong, Y. & Lin, J. (submitted). Parallel processing of the target language during source language comprehension in interpreting.

参 考 文 献

[1] 董燕萍、梁君英.走近构式语法[J].现代外语,2002(2).
 [2] 勒代雷.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刘和平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3] 勒代雷.论翻译学研究方法(刘和平译)[J].中国翻译,2010(2).
 [4] 王斌华.口译即释意?——关于释意理论及其有关争议的反思[J].外语研究,2008(5).
 [5] 许明.口译认知过程中“deverbalization”的认知诠释[J].中国翻译,2010(3).
 [6] 闫浩、董燕萍.语言产出中概念通达度对位置加工的作用:来自汉语名词并列结构的实证证据[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2).
 [7] 仲伟合、王斌华.口译研究的“名”与“实”——口译研究的学科理论建构之一[J].中国翻译,2010(5).
 [8] De Groot, A.M.B. The cognitive study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hree approaches [A]. In J.H. Danks, et al (eds.). *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C]. Thousand Oaks, London and New Delhi: Sage, 1997: 25-56.
 [9] Elston-Güttler, K. & Friederici, A. Native and L2 processing of homonyms in sentential context [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2005, 52 (2) : 256-283.
 [10] Green, D. Control, activation, and resource: A framework and a model for the control of speech in bilinguals [J]. *Brain and*

Language, 1986 (2) : 210-223.
 [11] Hartsuiker, R.J., Pickering, M.J. & Veltkamp, E. Is syntax separate or shared between languages? Cross-linguistic syntactic priming in Spanish/English bilinguals [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4, 15 (6) : 409-414.
 [12] Kempen, G. & Hoenkamp, E. An incremental procedural grammar for sentence formulation [J]. *Cognitive Science*, 1987, 11: 201-258.
 [13] Isham, W.P. Memory for sentence form after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Evidence both for and against deverbalization [A]. In S. Lambert & B. Moser-Mercer (eds.). *Bridging the Gap: Empirical Research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4: 191-211.
 [14] Kroll, J.R. & Steward, E. Category interference in translation and picture naming: Evidence for asymmetric connections between bilingual memory representations [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s*, 1994, 33 (2) : 149-174.
 [15] Köpcke, B. & Nespoulou, J.L. Working memory performance in expert and novice interpreters [J]. *Interpre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 Practice in Interpreting*, 2006, 8(1) : 1-23.
 [16] Lederer, M.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 units of meaning and other features [A]. In F. Pochhacker & M. Shlesinger (eds.). *The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 [C]. London: Routledge, 1978/2002: 130-140.
 [17] Lederer, M. *Translation: The Interpretive Model*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3.
 [18] Love, T., Maas, E. & Swinney, D.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exposure on lexical and syntactic language processing [J].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2003, 50 (3) : 204-216.
 [19] Macizo, P. & Bajo, M.T. When translation makes the difference: Sentence processing in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J]. *Psicologica*, 2004, 25 (2) : 181-205.
 [20] Macizo, P. & Bajo, M.T. Reading for repetition and reading for translation: do they involve the same processes? [J] *Cognition*, 2006, 99: 1-34.
 [21] Paradis, M. Toward a neurolinguistic theory of simultaneous translation: The framework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s*, 1994, 10 : 319-335.
 [22] Pickering, M. & V.S. Ferreira. Structural priming: A critical review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8, 134(3) : 427-459.
 [23] Prat-Sala, M., & Branigan, H. P. Discourse Constraints on Syntactic Processing in Language Production: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in English and Spanish [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42, 168-182.
 [24] Ruiz, C. et al. Activation of lexical and syntactic target language properties in translation [J]. *Acta Psychologica*, 2008, 128: 490-500.
 [25] Seleskovitch, D. Interpretation: A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ing [A]. In R.W. Brislin (ed.). *Translation: Applications and Research* [C]. New York: Gardner, 1976: 92-116.
 [26] Zhang, Q. *Mechanisms of Deverbalization in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Novice Interpreters* [D].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010.

[作者简介] 董燕萍, 博士,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心理语言学、口译心理。

王斌华, 博士,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 口译理论与实践。

[作者电子信箱] ypdong65@hotmail.com;
wangbinhua@hotmail.com

English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From the Archetype of the Western Translation Thought to a Translation Theory Reframed in Confucian Notions

by *CAI Xinl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p.5

Abstract :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been trapped in the postmodern logicism, unable even to define major genres such as literary translation. A way out of this quandary is to turn to Confucianism for a new conceptual framework. Confucian notions such as instructing (教, jiao), learning (学, xue) and likeness (如, ru) point to a non-logical way of thinking indispensab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For only through an instructing-enabled expansion of cultural field, and an esteem for the Other institutionalized in the concept of learning, can translation as communication become possible. And only for translation to aim for the likeness in representing the real can it attain its ultimate goal of helping to sustain humanity's cultural realm. Once being embedded in human life and imbued with a universal love (仁爱), translation would become synchronized with the historical change, and would appeal alike to those dwelling in the neighborhood and those coming from afar.

Key words : logicism; Confucius; instructing (教, jiao); learning (学, xue); likeness (如, ru); translation studies

A New Framework Model for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Studies

By *XU M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p.12

Abstract : Inspired by recent findings in bilingualism research, this article re-defines the objects and topics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studies in reference to a modulated account of the communicative processes involved, and proposes a framework model that centers on the interpreter's semantic memory and relies on the intermediacy of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Within such a framework, the author subjects three popularly adopted approaches to interpretation studies to a critical re-examination and recommends some alternativ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for researchers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cognitively-oriented research; methodology; experimental research; corpus-based research

General v. Interpretation-specific Language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A Two-Stage Account of the Interpreting Process

By *DONG Yanpi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China) & *WANG Binhua*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p.19

Abstract : This paper offers a two-stage account of the interpreting process on the basis of two hypotheses. The first one sees SL comprehension as being accompanied by a parallel processing of TL that merges with SL deverbalization through the function of incremental processing. The second hypothesis posits that unlike general language production, which is meaning-driven, TL production is driven by both construction and meaning. Treating neither "language switching" nor deverbalization as an independent stage of interpretation, this two-stage account explains more neatly the interpreting process than the traditional three-stage theory.

Key words : interpreting process; source language comprehension; deverbalization; parallel processing; target language production

How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Circulated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An Overview

By *MA Huiju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p.64

Abstract : This paper surveys the way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circulated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especially in the Anglosphere, with a view to casting some sidelight on China's on-going effort to globalize Chinese culture. It trie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are the models popularly adopted for translating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to English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Who have been responsible for translating the Chinese literature? What kind of source texts do they choose to translate? And How has the translated Chinese literature been received? By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the paper delves into existing problems of translating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by and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providing some suggestions about what China can do to facilitate the introduction of its own literature to the world.

Key words :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